

第一部分

佛 教 翻 译

一、佛教译场的发展

佛教从后汉传入中国，佛经的翻译事业也随之而起。桓帝灵帝时代，有安世高、支娄迦讖等译出数十部经典，自此直到清末，延续一千七百多年，不断地有许多人在从事翻译工作。从译场组织的发展来划分，约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草创时期 后汉桓帝——西晋（公元 148~316）

第二阶段 发展时期 东晋——隋（公元 317~617）

第三阶段 极盛时期 唐——北宋（公元 618~1126）

第四阶段 衰微时期 南宋——清（公元 1127~1912）

在佛教的译经史上，从后汉到鸠摩罗什以前为止，是一个阶段——古译时期；从罗什起到玄奘以前为止，是一个阶段——旧译时期；从玄奘起到北宋末，是一个阶段——新译时期。在这三个阶段中，每时期有每时期不同的译语译文译风与译品。现在配合着译经史的划期，把译场发展的情况作一个概括的介绍。民国以来，虽然有一些从藏文、巴利文、梵文和其他各国文字翻译的佛教著作；但是在规模上翻译上，都很难与过去相提并论，此处便不再涉及了。

（一）草创时期

佛教经典的传来，最初大部分是东来的天竺僧人或西域僧人用口诵出梵文或胡语，然后再行翻译。这一方面是由于天竺的习惯注重口授，师弟辗转相传，“不听载文”；一方面也是由于书写的困难。所以东晋法显到北天竺诸国求戒律还是“师师口传，无本可

写’在中印度则是自行缮写梵本赍归。北凉沮渠京声往西域也是口诵梵本东归。这种口诵出来的梵文，有两种翻译的方式：一种是先把梵文记录下来，再译为汉文；一种是口诵出来后，就由传言的人译为汉文。在早期虽有根据天竺僧人携来的梵本翻译的，但那并不是主要的形式。

这个时期是私人翻译的阶段，天竺僧人或西域僧人到中国来，遇到了有人请他译经，他便可以从事翻译。所以随地可译，并不问条件如何，人选如何；因此直接参与译事的是有数的几个人，在组织上是很不完备的。如：

《道行般若经》天竺菩萨竺朔佛口授月支菩萨支谶传言译语 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侍者孙和、周提立 劝助者。(后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十月十八日译。

《中本起经》曇果于迦毗罗卫国得梵本来至雒阳建安十二年(207)翻。康孟详，度语。

《首楞严经》月支优婆塞支施_𑖀手执胡本，归慈王世子帛延译者常侍西海赵潇、会水令马奕、内侍来恭政笔受。

《正法华经》：敦煌月支菩萨沙门法护，手执胡本口宣出；优婆塞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共笔受竺德成、竺文盛、严威伯、续文承、赵叔初、张文龙、陈长玄等共劝助欢喜(西晋)太康七年(286)八月十日译，九月二日讫。天竺沙门竺力、龟兹居士帛元信，共参校。

这里面仅有口授或执胡本的译主(传言译者或名度语)笔受(道行般若经中的侍者张少安就是笔受者)参校四种人员是实际工作者。劝助者则是出钱来供给和照料译事的人，是事务人员。

后汉三国期间口授梵文或手执梵本的译主，大都不通汉语，需要靠传言的人作通译，才能把梵文译成汉文。但是这个桥梁随时可以发生问题如吴竺将炎译《法句经》他‘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

失多不出者。”这恐怕是早期翻译者一般的现象。如果传言的人在了解上不能体会译主的意思，自然无从传达出译主的精神。同时笔受的人不是失之直译，便是失之意译，同样不能把译品用确切的辞句表达出来。到了西晋，有的译主如法护之流，可以说汉语，上面的困难便减少了许多。这是译学上的一大进步，为后来的翻译事业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时期

从东晋到隋，在译场的组织上，逐渐脱离了私人的、少数人的、小规模翻译而走上国家主持的、多数人的、大规模的翻译。在草创时期一个半世纪孕育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译主、译传和笔受人的语文了解上都提高了，打破了过去只通一方面语文——梵文或汉文——的阻碍，能够互相融会起来。译文也更加精炼华美，在当时骈俪风行的文体中，别树一帜而自成风格。在由私人译场转变到国家译场的过渡中，可以用道安和鸠摩罗什作代表，来看译场演进的轨迹。

道安在长安，极力奖励译事，苻坚的秘书郎赵整，对译经也极为维护，东来的梵僧在他们主持下译出很多重要的经论：

《十诵比丘戒本》：外国道人昙摩持口诵出，凉州沙门佛念写梵文，道贤译传，慧常笔受。

《鼻奈耶律》：罽宾耶舍诵出，鸠摩罗佛提梵书，佛念译传；昙景，笔受。

《鞞婆沙论》：罽宾沙门僧伽跋澄口授，昙无难提笔受为梵文，弗图罗刹译传，敏智笔受为秦言，赵整、正义、道安对校。

《阿毗昙八键度论》：罽宾沙门僧伽禰婆，诵出；佛念，译传，慧力、僧茂笔受，法和、请出，并理其指归。

《四阿含暮抄》 鸠摩罗佛提 执胡本 佛念、佛护 译传 僧导、昙究、僧睿 笔受。

《婆须蜜论》 僧伽跋澄、难陀、僧伽提婆 执梵本 佛念 译传 慧嵩 笔受 赵整 润色 道安、法和 对校修饰。

《增一阿含经》 外国沙门昙摩难提 口授 佛念 译传 昙嵩 笔受 道安、法和 考正 僧 翳、僧茂，助校漏失。

从道安、赵整主持的译场来看，工作人员增加了，分工也周密了。译《婆须蜜论》 是三位译主共同负责 译传佛念则是“洞晓方言 学兼内外”的人。此外译经还有润色、考正、对校的人 在组织上，已有后代译经院的初步规模。晋泰元十六年（391）僧伽提婆在寻阳南山精舍译《阿毗昙心论》 有上座僧竺僧根、支僧纯等八十人参与译席（江州刺史王凝之、西阳太守任固之为檀越 译场规模相当的大。）这已予后来国立译场千八百人参加译席的局面开辟了道路。

鸠摩罗什在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请他在西明阁逍遥园及大寺译出经论三百余部，从此大规模的译场，在封建统治者帝王的主持下便开始了。在这种译场中，不但有硕学专家兼通梵汉的译主，而且还集中了大量对教理有深刻研究有学问能文章的僧人作助手，（其中有些是对翻译有经验的僧人，如曾参加道安主持的译场的法和、僧睿、僧 翳、僧导、佛念 都参加在罗什译场之内。当时义学沙门云集长安，给予罗什翻译以很优越的条件。）所以他的译品一出世，便突破了旧有译品的水平，而在宗教界、学术界里奠定了崇高的地位。

罗什于弘始五年（403）译《小品般若经》“手执胡本 口宣秦言 两释异音 交辩文旨。秦王 姚兴 躬揽旧经 验其得失 咨其通途，坦其宗致。与诸宿旧义业沙门释慧恭、僧 翳、僧迁、宝度、慧精、法钦、道流、僧睿、道恢、道标、道恒、道惊等五百余人 详其义旨 审其文中 然后书之。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尽 校正检括 明年四月

二十三日乃讫。”（《经序》）弘始八年（406）译《妙法莲华经》，“于长安大寺集四方义学沙门二千余人更出此经，与众详究。什自手执胡经，口译秦言，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法华宗要序》）同年译维摩诘经，姚兴“命大将军常山公左将军安城侯与义学沙门千二百人于长安大寺请罗什法师重译正本。什以高世之量，冥心真境，既尽环中，又善方言，时手执胡文，口自宣译。道俗虔虔，一言三覆。”（《经序》）从上可以看出罗什的译场规模是如何之大。（罗什译《大智度论》是五百余人共集，译《思益经》是二千余人咨悟。此外如姚秦佛陀耶舍译《四分律》是三百余人陶练，北凉县无谿译《优婆塞戒》，是五百余人共译；北凉浮陀跋摩译《毗婆沙》，是三百余人考文详义，刘宋求那跋陀罗译《胜鬘经》是德行诸僧慧严等一百余人考音详义。译时不但翻译而且讲授，所以那些助手很多就是听讲的弟子。）罗什译《法华经》，“尝指其大归，释言表之隐，以应探赜之求。”译《思益经》是“披释玄旨，晓大归于句下。”此外如陈真谛译《大乘唯识论》是“行翻行讲”。译《摄大乘论》是“边翻边讲”，释义若竟，方乃著文”。而且译场也是论场，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互相辩论，互相斟酌，所以“一言三覆”，“详其文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如陈月婆首那译《胜天王般若经》在江州刺史黄法氾的厅事，开题序说无遮大会，四众云集五千余人。匡山僧果法师及远迹名德，并学冠百家，博通五部，各有硕难纷纭，靡不涣然冰释。就是先讲题旨，论辩后再翻译的。对于旧有的译本，是拿来作参考的。而校勘的时间，有的竟占翻译时间一半以上。）罗什译《大品般若经》用了八个月，校勘则用了四个月的时间。）

在此时期，另有二事可以注意：一是翻译根据的底本不止一个梵本。如行矩因为宋代慧简译的《药师本愿经》“文辞杂糅”，所以“思遇此经，梵本验其纰缪”，在“开皇十七年（579）初获一本，犹恐脱语，未敢即翻。至大业十一年（615）复得二本，更相讎比，方为楷定。”这时因为中印的交通发达，通梵文的人多了，所以大家都以梵

本为定本 不像过去多以胡本、于闐本、龟兹本、月支本等 为根据了；再就是梵本传来的多了，译一书根据的不止一个底本，可以参照几个不同的语文的本子来翻译。二是隋以前一些封建帝王主持的译场，除姚秦的逍遥园外，北凉有姑臧的闲豫宫译场（沮渠牧犍请浮陀跋摩于此译《大毗婆沙论》）梁有建业的寿光殿、华林园、占云馆 武帝请僧伽婆罗于此译《阿育王经》及宝云殿译场（武帝请真谛于此译《金光明经》）北魏有洛阳的内殿译场 宣武帝请菩提留支于此译《十地经论》），但都是临时性质。到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在洛阳洛水南滨上林园内置翻经馆“，搜举翘秀 永镇传法，四事供奉 复恒常度 使译人不坠其绪 成简无替于时。”并且“供给事隆 倍逾关辅。”关辅是指罗什在长安的译场而言 除三藏法师（达磨笈多）外 还有翻经法师 彦惊、法行、明则等 翻经学士 费长房）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成立了正规的永久的国立译场。这是自罗什以来封建帝王重视译事更进一步的结果，纠正了过去因人而临时成立译场的权宜设施。这不但提高了译品的质与量 而且是政府把佛典翻译视为沟通中印文化的一件大事的表现。虽然炀帝只有十几年便灭亡了 翻经馆的作用发挥得并不大 仅译出九部经），但是却为唐代的‘新译’铺平了道路。

（三）极盛时期

在‘旧译’的基础上 又有梁、陈的真谛三藏作先声 唐代于是产生出伟大的玄奘法师，在佛教的翻译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一页。他在贡献上 不但译出一千三百多卷大量的经论 而且是‘新译’的创始人。

玄奘在贞观十九年（645）从印度回到长安，奉敕安置在弘福寺，一切由政府供给，并有二十一位学通内外的名僧来共同翻译。如：

《瑜伽师地论》三藏法师玄奘 执梵文译为唐语 灵会、灵隼、智开、知仁、玄度、道卓、道观、明觉 承义笔受 玄暮 证梵语 玄应 正字 道洪、明琰、法祥、惠贵、文备、神泰、道深、详证大义。

《本地分》中：《五识身相应地》、《意地》、《有寻有伺地》、《无寻唯伺地》、《无寻无伺地》 凡十卷 道智 受旨缀文。

《三摩_囉多地》、《非三摩_囉多地》、《有心无心地》、《闻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 凡十卷 行友 受旨缀文。

《声闻地》初《瑜伽种性地》尽《第二瑜伽处》 凡九卷 玄贲 受旨缀文。

《声闻地》《第三瑜伽处》尽，《独觉地》 凡五卷 玄忠 受旨缀文。

《菩萨地》、《有余依地》、《无余依地》 凡十六卷 靖迈 受旨缀文。

《摄决择分》 凡三十卷 辩机 受旨缀文。

《摄异门分》、《摄释分》 凡四卷 处衡 受旨缀文。

《摄事分》 十六卷 明浚 受旨缀文。

银青光禄大夫许敬宗，奉诏监阅。

这部论是贞观廿一年（647）五月十五日至廿二年五月十五日译出的一百卷大著作，二十五位有学识的名僧在玄奘的主译下完成这样伟大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玄奘自从贞观二十三年回到大慈恩寺以后，便专务翻译，每天自己规定好一定的进度，如果白天有事耽误了工作 必定连夜来补齐 到二更方才停笔。三更睡眠 五更便起来读诵梵本，用朱笔点好，预备第二天来翻译。这样巨续工作了十五年，才创造出那样伟大的成绩。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证圣元年（695）从天竺留学二十多年的义净归国 译出二百三十卷经论，在“新译”中是继玄奘而起的重要翻译家之一。如：

《成唯识宝生论》：三藏法师义净，宣释梵文并缀文正字；翻经沙门达林磨、拔努 证梵义 翻经沙门达摩难陀、婆罗门伊舍罗 证梵本 翻经沙门惠沼、道琳、利明、道恪、胜庄、惠伞 证义 翻经沙门玄伞 证义 笔受 翻经沙门智积 证义正字 翻经沙门惠积、李释迦、度颇具 读梵本 瞿昙金刚、阿顺、李输罗，证译；金紫光禄大夫匡巨源及修文馆学士三十三人，同监；金紫光禄大夫嗣虢王邕、判官刘令植，监护。

“新译”大家的记载里 可以看出这期的翻译分工更为周密 除去历代译场已有过的人选外，又增加了证梵语（即证梵本）、证梵义、证译、证大义、正字、缀文、监护、监阅（即监译）等人员。尤其《瑜伽师地论》是分由许多对教理有专门研究的人缀文，这更说明了对译文的重视。这两位中国翻译家主持译场，在梵文、汉文的理解上、译译上，比之过去，自然要更忠实更正确更优越了。

赵宋的翻译是继承唐代旧有的规模。如：

《大乘庄严宝王经》三藏天息灾 译 法天 证梵义 施护，证梵文 清沼、常谨 笔受 法进 缀文 惠温、守恁、道真、真显、慧超、慧达、可瓌，证义；法云、智游、善祐，校勘；光禄卿汤悦 兵部员外郎张洎，润文；殿直刘素，监译。

参与译事的人员与唐代基本上是一样的。

唐太宗起初在宫中建弘法院安置玄奘。贞观二十一年，在长安大慈恩寺别造翻经院，“虹梁藻井，丹青云气，琼础铜楮，金环华铺”，极富丽堂皇之致，玄奘就在其中译出许多经典。和帝神龙二年，置翻经院于大荐福寺，由义净来主译。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于太平兴国寺建译经院为三堂：中间是译经场所，东序是润文场所，西序是证义场所。复兴自唐贞元以来约二百年已间断的译经事业。天息灾为译主，由两街僧选义学沙门百人来详定经义。八年（983）译经院改名为传法院，仍继续翻译。日本僧人成寻在熙宁五年（1072）到宋，曾巡礼太平兴国寺的传法院，其日记中载有当时

从事翻译人员的名单：

大卿者：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宣梵大师赐紫，日称；小卿者：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同译经宣梵大师赐紫，慧贤；三藏者：诏同译经梵才大师赐紫，惠询；译经证义：文章文惠大师赐紫，智普；译经证义：讲经论慈济大师赐紫，智放；译经证义：西天广梵大师赐紫，天吉祥；译经正梵学：梵惠大师赐紫，师远；译经正梵学：广智大师赐紫，惠琢；译经笔受：崇梵大师赐紫，明远；左街副僧录同知教门公事译经证义兼缀文：文鉴大师赐紫，用宁；右街副僧录同知教门公事译经证义兼缀文：澄鉴大师赐紫，文素；左街讲论首座译经证义：宣密大师赐紫，显静；左街鉴义译经证义：慈云大师赐紫，清振；译经证义：讲经论宝惠大师赐紫，可熙；译经证义：讲经论明义大师赐紫，清衍；译经证义：讲经论赐紫，文正；译经笔受：清楚大师赐紫，智宝；译经正梵学：宗梵大师赐紫，惠海。

从这里可以看出国立译场中工作人员的职位和名义。这个译场至景祐四年（1037）才告停顿，凡五十六年，共译出五百多卷经论。

宋朝赞宁有一篇论译场设官分职的文字，记唐、宋两代译场的人选和任务，虽然也涉及前代，但是以唐宋为主。其中解释职务的地方，可以和上列名单参照。

译主：即赅贝叶梵本来的三藏，通显密二教的人。

笔受：通梵汉两方面的语言，对教理也有深刻的认识，听了译主的翻译，再结合自己的认识，用笔记录下来。或名为缀文（按缀文与笔受的任务不同，见后）。

度语：或名译语、传语，就是把梵文用口译为汉语。

证梵本：考察梵本原文有没有差误。

证梵义：考察梵文意义的得失，使译为汉语后，不失梵文原意。

证禅义：经中关于禅定的部分，考察其理论有没有错误。

润文：通内外学的人担任此职，将笔受好的文字加以润色修饰，而要不失原意。人数不定。

证义：考察译文所讲的理论对不对。

梵呗：在翻译开始时奏梵呗。这是宗教仪式，唐永泰年间（765~766）开始设置的。

校勘：讎对译出来的文字，与梵文原本切合不切合。

监护大使：总理译场一切有关翻译的事情，并诠定宗旨。此职大都由官吏充任，间或由僧人担任。

正字：对文字学有研究的人充任，纠正译文中文字上的错误。

关于译经仪式，天息灾有一篇记载，使我们大略还可以看出宋代译经的程序和译经院的规模。

译经仪式说：

在东堂面向西作一个“曼荼罗”（坛），举行宗教仪式后，便开始翻译。

第一是译主，正坐，脸向外，宣读梵文。

第二是证义，坐在译主左边，和译主商量梵文的意义恰当不恰当。

第三是证文，坐在译主右边，听译主高声宣读梵文，勘验有没有错误。

第四是书字，仔细听译主宣读的梵文，写成汉字，但还是梵音。如 *Sūtra* 写作“素怛览”。

第五是笔受，把梵音改为汉言。如把“素怛览”译为“经”字。

第六是缀文，颠倒已译成汉文的字句，使辞句的排列合于汉文文法，成为汉话。梵文动词是放在宾语下面，如佛念、钟打，则要把动词颠倒过来，放在宾语的上面，改为念佛、打钟。

第七是参译，对照梵汉双方的文字，看看翻译有没有错误。

第八是刊定，刊削过于冗长不合汉文文法的词句，修补不太明了的语句。

第九是润文官，位子设在僧众的南边，参详字句，润色文字。

这些出家人每日沐浴，一切服饰用度，都由官家供给。

他把翻译的程序说得很清楚。在职掌上，与前面所记载的略有出入，这里大概是泛指一般的规模而言，人选的增多或减少，则要看实际的需要来确定。所以各地译场，以及同一译场内，由于所译经论的不同，设置的人员也就不能完全一致了。

在这期中，既不同于草创时期的天竺人或西域人以通译为媒介，把梵文或胡语译为汉文，中间有很大的麇杂和隔阂；也不同于发展时期，天竺人或西域人虽已熟悉汉语，但是把梵文或胡语译为汉文，到底还有着一层民族的隔膜；现在则是中国人精通梵文，又有汉文的修养，把梵文译为汉文，自然是水乳交融，毫无阻碍。所以这期译经达到了翻译最高峰，成为佛教翻译的黄金时代！

（四）衰微时期

自南宋以来，佛教的译经事业，便进入衰微时期，记载中不见南宋有一部译经。元代虽有拔合思巴、管主八等数人奉诏翻译，但译品只寥寥十数部，也很少重要的作品。在明代三百多年中，译者只智光等一二人，译了很少的几部经。清代也只工布查布等五个人译了几部经。而且这时期的原本，大半是藏文，因为在印度本身，佛教已殆近绝灭，旧的重要的著作，大都已有汉文译本；新的著作根本没有，所以翻译梵文的事业，也随之中断了。

总结起来，佛教的译场，是根据多年的经验，逐渐发展而成

为完善的组织。在中印文化的沟通上，起过伟大的桥梁作用，它有些地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1. 集体翻译分工合作的制度。

2. 主译的人不但擅长双方的语文，而且对所翻的作品有深刻的研究，是这一学派的学者或权威者，翻译也是他终身的事业。

3. 翻译时译主对译品加以讲解，并且展开论辩。

4. 每部作品译完后，要经过润文、证义、证译、正字、校勘等缜密的手续，来纠正译品文字上和意义上的错误，提高译文的正确性。

5. 各部门的人选都是专门人材。如：传译、笔受是对双方文字有研究的人；证义是对所译作品的理论有深刻研究的人；润文是文学家，正字是小学家。

6. 重视译品的文字。不但笔受的人要有文学的修养，而且还必须经过润文的修饰，才能问世。

7. 重视译毕覆勘的工作。

8. 专人料理一切有关翻译上的事务，使译人能专心工作。

佛教翻译制度的一些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翻译工作，是很好的参考，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的。

二、道安法师在佛典翻译上的贡献

(一)

道安(312~385)法师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生当中印佛教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东晋时代。公元379年，在我国北方割据称雄的苻秦政权攻占了襄阳。避居襄阳弘法的道安

法师被送到长安。此前，道安与秦主苻坚曾经有过一段因缘：道安在襄阳时，苻坚遣使送给他外国金箔倚像、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高僧传》卷五《道安传》），送像的年代虽不可考，但是在建元十三年（377）时“太史奏：‘有星见于外国之分，当有圣人入辅中国，得之者昌。’坚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释道安，并遣求之。”（《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十五）送像当就在此前后。后来道安到了长安，极为苻坚所尊重。《晋书·苻坚载记》上载：“〔坚〕游于东苑，命沙门道安同辇。权翼谏……坚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为时尊，朕举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与辇之荣，此乃朕之显也！’命翼扶安升辇。”并且曾敕内外学士，有疑义都请教于安，所以当时长安流传有“学不师安，义不中难”的谚语（《高僧传》卷五《道安传》）。

自公元三世纪以来，长安便是中国佛教的重镇。从三世纪的六十年代起，至三世纪末，竺法护曾在此译出数十部经典。同时，帛法祖在长安筑精舍，讲习佛典，从学者近千人。再者长安也是通西域的要道，苻坚攻取凉州后，威名远振，鄯善、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于阗、康居诸国也都来贡献方物。公元382年，苻坚令吕光平西域，于是中西的交通更为畅通，经西域来华的僧人也逐渐增多。这是道安所以能从事翻译的优越条件。我们试看同时期在南方的东晋，只有西域沙门竺昙无兰在扬都译出六十一部六十三卷佛经，（见《开元录》卷三）大部分是小乘经。当时南方环境比较平静，而翻译仅一人；在秦地道安能够集中好几位印度专家从事有组织有计划的翻译工作，这与苻坚的提倡佛教和长安的地理优势是有着密切的关系。

道安到长安，已是67岁高龄。他一向以学识渊博、理解高超、修养精纯见称，到这时又为什么热心起翻译工作呢？其实这种动机在他过去讲经注经时就蕴集于心。他注经时说过：“方言殊音，文质从异，译梵为晋，非出一人，或善梵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

梵。”（《出三藏记集》卷五）因梵汉文字不同，所以感到“每至滞句，首尾隐没”的苦恼。注释虽然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并不是根本的办法。《道安传》上也说：“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高僧传》卷五）这时有了请到主译专家的有利条件，所以他便积极热心的承担起这项任务来。再加上苻坚的秘书郎赵政（是一位佛教信徒，后来出家名道整）的赞助，苻秦的佛典翻译事业便在他二人的主持下开始进行。

当时从西域来的经师有下面六个人。道安曾经劝苻坚迎接鸠摩罗什（《见高僧传·道安传》，建元十八年 382）坚遣吕光伐龟兹，得罗什，及归，苻秦已灭亡，而后罗什乃为姚兴所礼接。此事关系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道安在这点上是有远见和大功的）僧伽跋澄等的到长安译经，一定与道安的延揽有关。

沙门昙摩持（或作侍，Dharmakh），译名法慧（或法海），西域人，善律藏，译《十诵戒本》等三部（《开元录》卷三）。

沙门鸠摩罗佛提（kumârabuddhi），译名童觉，西域人，建元十八年译出《四阿含暮抄》等三部（《开元录》卷三）。

沙门僧伽跋澄（Sanghabhūti），译名众现，罽宾人，善数论，谙诵《鞞婆沙》，贯通妙旨。建元末来长安，当时数论盛行，跋澄既至，众称之为法匠。赵政礼请，自建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381～385），译出《婆须蜜集》等三部（《高僧传》卷一）。

沙门昙摩婢（Dharmapriya）译名法爱，印度人，译出《摩诃般若婆罗蜜抄经》一部（《开元录》卷三）。

沙门僧伽提婆（或作提和 Sanghadeva）译名众天，罽宾人，建元十九年（383）来游长安，法和请令翻译出《八键度论》等二部（《高僧传》卷一）。

沙门昙摩难提（Dharmanandi），译名法喜，兜佉勒国人，谙诵《中阿含》及《增一阿含》，为国内所推服。建元二十年

(384) 来长安，苻坚深见礼接，赵政、道安请出二《阿含》。乃在长安城内集义学沙门写出二《阿含》梵本，再行翻译，至二十一年讫（《高僧传》卷一）。

这些人都是精通小乘经律论的学者。当时担任通译的重要译师有：

沙门佛图罗刹（Buddhavaksha），译名佛护，博览经典，久游中土，通达汉语，译经时任通译（《高僧传》卷一）。

佛念，凉州人，弱年出家，讽习众经，粗涉外典，深明诂训，洞晓方言，华梵音义。译经时任通译，为众所重（《高僧传》卷一）。

从翻译的组织来看，人选比过去增多了，分工周密了，翻译手续比过去完备了；对校、正义、考正、润文等以前所不曾注意的环节，现在重视了。这给后来的国立译场开创了初步的规模；也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使私人译经走向国立译场。

（二）

道安是从事佛典翻译的主持与校讎工作的，每经译出后，他都亲手校订，序其缘起。他不但是对教理有深刻研究的佛学家，也是对文学有深厚修养的文学家。他根据过去阅读佛经、讲解佛经和整理佛经目录的经验，再加上参与翻译工作的经验，在建元十八年，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五失本是：

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

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

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

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

五者事已全成，将更旁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

除此，五失本也。

三不易是：

《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

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

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

（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

“三不易”说明梵语雅古，佛经深奥，传译是极难的工作。他提醒译人在翻译时要以严肃负责的态度，谨慎从事，尽量把原意传达过来，不使它有错误。“五失本”是实际翻译的标准问题。归纳起来，可以分做三项来研究。第一项是文法上的问题。梵语名词、代名词、形容词等有三性、三教、八格的分别，动词有六时辞法、语气的分别，语尾的变化也很繁杂。在句法上每一个词的位置也与汉文不同，如果按梵本“对翻、直译”，而不回缀文字，则读起来不但不顺，不像汉语，甚至也读不懂。最好的例子就是隋代笈多译的《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现在试摘一段与玄奘译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作一个对照：

《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	《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隋 笈多 译	唐 玄奘 译
<p>如是我闻，一时，世尊闻者游行胜林中，无亲抆施与园中，大比丘众共半三十比丘百。尔时世尊前分时，上裙著已，器上络，衣持，闻者大城转为入。尔时世尊闻者大城转为</p>	<p>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室罗筏，住逝多林，给孤独园，与大苾刍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于日初分，整理常服，</p>